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在何处

□ 杨朝明

新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是贯穿价值、人性、空间、历史四大维度的实践智慧。以儒学为核心，这四重维度层层递进，构建起“大而久”的文明体系

●重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需避免两种极端：一是将“优”等同于“复古”，忽视时代性转化；二是将“优”视为封闭的“文化特权”，排斥外来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维之优”，并非历史陈列，而是解决当代问题的重要资源，无论是个体道德修养、社会伦理构建，还是国家发展、全球治理，都能从中汲取智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在何处？如何辩证地看待“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出哪些时代价值？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承载着文明连续性的精神密码，其“优”既体现为历史上的凝聚力与生命力，更在于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刻回应力。重识这份“优”的内涵，辩证把握其价值，方能民族复兴注入深厚文化动力。

“优”之智慧

基于儒学的四重维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是贯穿价值、人性、空间、历史四大维度的实践智慧。以儒学为核心，这四重维度层层递进，构建起“大而久”的文明体系。

价值维度上，体现为从个人到天下的公共性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首要优势，在于其超越个体私利，指向公共价值的追求。这一追求以儒学“仁”为核心，形成从个人修身到天下大同的完整逻辑链。

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奠定早期礼乐文明框架；春秋“礼坏乐崩”后，孔子以“仁”释礼，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将外在礼仪规范转化为内在道德自觉。这种转化并非封闭的个体修养，而是“差序格局”的扩展：从对亲人的“孝悌”出发，经“泛爱众”延伸至对他人的关爱，最终升华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种“关注中心的不断超越”（从自身到家庭、社会、国家，再到全人类），正是中华文明能“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几千年”（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语）的关键。

《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的理念，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价值追求的源头。中国先民以“天下”“四海”构建世界认知，本质是开放大度的文明观，不同于局限于民族或地域狭隘利益，而是关切人类共同命运。钱穆先生等评价孔子承前启后，都是看到他“集前两千五百年之大成，开后两千五百年之新统”。正因孔子将这种公共性追求凝练为儒学核心，使中华文明始终聚“人类整体利益”。

人性维度上，体现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德性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重优势，在于不将“人”视为纯粹自然存在，而是通过德性培养，实现“自然人”向“社会人”的升华。这一过程以儒学心性论为指导，形成系统的教化体系与实践方法。

孔子的施教体系堪称典范。据《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其教化路径为“先之以诗书，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以“诗书”奠定文化根基，以“孝悌”引导家庭伦理，以“仁义”涵养道德自觉，以“礼乐”规范行为举止，最终以“文德”成就完整人

格。这种教化与心性修养贯通。《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认为人需遵循天命所赋的“善性”（含仁义礼智），通过教化实现“中和”之境；孟子“养气说”中“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的境界，承自孔子“志之所至，气亦至焉”的“五至”说（《孔子家语·论礼》），核心是通过“集义”的道德实践，让内在德性外化为行动力量。

这种德性培养有坚实支撑：孟子“性善论”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提供人性依据；荀子“性恶论”注重礼法教化，补充外在规范；家庭以“父慈子孝”塑造个体品格，再扩展为孔子“正名”思想、董仲舒“三纲五常”等社会规范，确保德性从私人领域延伸至公共领域。正如《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三国刘劭《人物志》直言“人道之极，莫过爱敬”，这种对“德性饱满”的追求，让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精神内核的连续性。

空间维度上，体现为从本上到多元的包容共生。中华传统文化第三重优势，在于具备“由内而外”的包容基因：以本土文化为主体性根基，同时以开放姿态吸收外来元素，形成“和而不同”的文明格局。这种智慧在儒学中体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延伸，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

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直指儒学“内圣外王”的核心，正如《大学》里提出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就是构建了从个体道德到天下治理的连贯体系。该体系极具适应性：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传统文化包容性的继承，将“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理想相契合，赋予传统价值新内涵。

这种包容性还体现在经典传承与教育体系中。从先秦“六经”到汉代“五经”再到宋代“十三经”，经典文本的丰富始终以儒学核心价值为根基；阐释方法历经汉儒“章句训诂”，宋儒“义理发挥”至清儒“汉宋兼采”，让经典能与时代对话。教育体系亦延续此传统：古代官学与书院以儒家经典为核心，1905年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仍保留“读经”“修身”课，当代“立德树人”理念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教育结合，确保文化基因代际传递。

历史维度上，体现为从古至今的守正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四重优势，在于不固守传统，不割裂历史，以“守正创新”实现数千年连续传承。这种韧性在儒学中体现为对“三代”文明的继承，以及对不同时代文化的“损益”与

转化。从夏代“尊命”，商代“尊神”到周代“尊礼”，早期中华文明已形成“因革损益”的传承机制。孔子明确提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并推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本质是在坚守文明核心（如“礼”的秩序、“德”的追求）的基础上，依时代需求调整形式。这一机制让中华文明避免了因政治动荡或外来冲击导致的文化断裂——即便在蒙元、清代等多民族政权时期，儒学仍作为文化核心维系着文明认同。

对外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凸显这种韧性：佛教传入后，与儒学、道家融合形成“儒释道合一”形态；近代以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中体西用”，在坚守文化主体的同时吸收西方科技；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仍从儒家“大同”思想寻找与社会主义的契合点；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源于“天下为公”的传统智慧，回应全球化挑战。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亦如此：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元代杂剧吸收蒙古音乐，清代满汉文化交融，不仅未削弱中华文明主体性，反而丰富其内涵，增强文明韧性。

“优”之认知

辩证视域下主体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重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需避免两种极端：一是将“优”等同于“复古”，忽视时代性转化；二是将“优”视为封闭的“文化特权”，排斥外来文明。正确认知应立足“主体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把握“立优”的本质与实践路径。

“优”的本质，是以本土主体性为根基的开放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绝非“排外”优势，而是以自身核心价值为根基，兼容多元的智慧。正如儒学虽吸收道家“无为”、法家“法治”思想，却始终以“仁”为核心；佛教中国化虽融入禅宗智慧，却未取代儒学的社会伦理地位。唐代长安、宋代泉州的开放，本质是对本土文化的自信——既能接纳外来商人、宗教与艺术，又不盲从外来价值；当代对待西方文明，同样需在坚守“仁”“和”“天下为公”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吸收其科技、管理等先进成果，避免陷入“全盘西化”或“封闭保守”的误区。

“优”的实现，需经时代性的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并非现成“标准答案”，而是需结合当代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例如，传统“孝”文化需从封建“愚孝”重拾或转化为当代家庭责任与养老伦理；“家国情怀”需从士大夫的“忠君”转化为公民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担当；“天人合一”需从古代“顺天应时”转化为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如推进植树造林、碳达峰碳中和）。正如共产党人将“天下为公”诠释为“为人民服务”，将“修身为本”诠释为“党性修养”，只有赋予传统价值新的时代内涵，其“优”才能真正落地。

“优”之价值

回应时代问题与促进文明对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维之优”，并非历史陈列，而是解决当代问题的重要资源，无论是个体道德修养、社会伦理构建，还是国家发展、全球治理，都能从中汲取智慧。

对个体与社会：重塑伦理秩序与精神家园。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儒学“修身为本”的理念为个体提供精神锚点。传统“孝悌”“诚信”“仁义”等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高度契合。通过家庭伦理培养个体责任感，通过“慎独”“自省”提升道德自觉，既能缓解当代人的精神焦虑，又能促进社会和谐。士大夫“以道统制约政统”的追求（如董仲舒“天人三策”、王阳明“致良知”），可为当代公职人员道德建设提供借鉴；屈原的爱国赤诚、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可转化为当代公民的社会责任，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对国家发展：助力文化强国与生态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厚根基。“天人合一”“保合太和”（《易经》）的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哲学依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是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转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为国家治理提供文化支撑：从家庭文明建设到基层社会治理，从干部道德修养到国家政策制定，传统文化的价值维度能增强治理的人文温度。此外，故宫文创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更有力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对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文明方案。在文明冲突论抬头的当下，中华传统文化之“优”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路径。“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源头。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共同发展，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议题的合作，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是对传统“天下”智慧的当代实践。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更是对儒学“和而不同”理念的现代诠释：尊重不同文明差异，不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通过文明互鉴实现共同繁荣，为构建和谐世界秩序提供重要启示。

综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在于以儒学为核心的四重维度：超越个体私利的公共价值追求，塑造德性的人性修养工夫，包容多元的文化基因，守正创新的历史韧性。这些“优”并非静止遗产，而是需要当代人以“守正”为根基，以“创新”为路径，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深刻把握这份“优”的内涵，辩证看待其价值，才能让数千年的文明智慧在当代焕发生机，为铸就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辉煌，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以「微行动」汇聚「大合力」

□ 史家亮 于佳禾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出现‘断头路’”，同时强调要推动各方“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形成“做好社会工作的强大合力”。在此背景下，通过一系列微小但具体的行动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先锋“微行动”以其细致性、即时性、示范性，成为激活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依托组织整合与机制协同，党员先锋“微行动”有利于将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形成治理“大合力”，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

一是破解基层治理末梢堵点，打通服务最后一米。基层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最后一公里”治理难题的实质，在于行政力量与群众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因为资源分配存在层级化、服务难以精准在滞后性，行政体系往往难以精准匹配政策执行，难以快速响应居民的个性化需求，群众常面临“小事难办、急事难应”的困扰。党员先锋“微行动”以其灵活性和即时性特征，有效填补了这一治理缝隙。党员个体深入社区楼栋、街巷院落，将治理重心下移到家庭、邻里层面，构建起覆盖全域、直达末梢的服务体系。这种零距离的服务机制既化解了“看得见管不着”的尴尬，又能即时响应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党员先锋“微行动”能有效推动治理重心真正下沉到群众日常生活场景之中，从而有效推进基层治理模式由“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转型。

二是激发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激活治理关键支点。基层治理不能依靠“政府推动”，更需要群众的“主动参与”。党员先锋“微行动”通过“身边人带动身边事”的方式能够有效激活基层社会的“神经末梢”。党员先锋以身作则的行动实践，将抽象的治理目标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具体行动，例如垃圾分类、邻里调解、环境整治等，降低了群众参与的门槛与成本。这种“以点带面”的模式，让群众在解决身边小事中积累成就感，逐步形成“共建共治”的自觉性。同时，“微行动”通过积分管理、荣誉表彰等方式，将个体贡献转化为集体认同，增强了群众在治理中的主体性与获得感，为基层治理注入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三是提升党组织组织力与凝聚力，探索党建有效路径。党组织的组织力与凝聚力是基层治理的根本保障。党员先锋“微行动”既是锤炼党员党性的实践载体，也是密切党群关系的纽带。在解决群众困难的过程中，党员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深化了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理解，也强化了党组织的宗旨意识与责任担当。此外，党员先锋“微行动”通过加强统筹协调、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动员群众参与，有效整合了分散的党员力量，形成了服务群众的力量，切实增强了党组织在基层的组织存在、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统筹能力。

四是筑牢基层风险防范屏障，提供稳定坚实保障。基层稳定是社会治理体系有效运行的底线要求。基层党员具有分布广泛、工作贴近群众的独特优势，这使基层党员能够提前为风险进行预警，能够及时合理地化解矛盾。依托日常走访与网格化管理的机制，党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安全隐患、苗头性矛盾纠纷等问题，并及时采取现场调解、信息上报等方式，力求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矛盾的升级。这种“平时服务、急时应急”的机制，既强化了基层有效应对风险的能力，又在服务群众、排忧解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群众信任，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党员“执行力”与“凝聚力”是治理效能转化的核心纽带，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执行力和担当精神上。基层党员先锋的执行力是党的政策在基层落实的重要基础，党员作为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其高效务实的行动将政策要求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从而推动党的意志真正惠及人民群众。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将党员先锋“微行动”融入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通过整体联动、协同高效的治理机制，有效解决治理资源分散、力量不聚的问题。

一是加强队伍建设，优化队伍结构，精准设定职责。汇聚“大合力”的关键在于选拔各领域优秀骨干党员，配齐一支基层治理的带头人队伍。党员的内生动力源于其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契合。需要指出的是，党员人才的优势特长和个人意愿各不相同，各地地区的区情、发展模式、资源禀赋也存在差异，这决定了其人才需求、选拔集策的方法需要多样化。因此，只有结合党员专业背景，优化人岗匹配，将党员个体的价值实现精准指向服务群众、推动治理的集体目标，这样党员才能通过“微行动”充分释放个体潜能，使“微行动”真正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关键着力点。

二是完善制度建设，健全协同机制。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提升基层党员队伍的管理水平，是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重点，也是推动“微行动”有效汇聚成“大合力”的长效保障。为此，必须着力构建系统完备、衔接顺畅、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与协同框架。工作重点在于：一要细化“微行动”的岗位职责与评价标准，确保行动目标清晰、操作规范；二要打破层级壁垒，促进资源和信息共享，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紧密协作，使党员个体发现的“微问题”能迅速调动多方力量协同解决。

三是搭建多元平台，创新组织生活内容形式。党员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微行动”，发挥个体的作用，需要有效的载体作为支撑。因此，应精心打造承载“微行动”“催化”“大合力”的实体与线上平台，并推动组织生活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实践，例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创设“微心愿墙”等互动载体；运用智慧党建平台等线上工具，实现行动动态分享和经验实时交流。通过搭建多样化的参与平台，为党员先锋开展“微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强化基层治理“大合力”的根基。

四是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党员素质。党员素养是保障“微行动”高效高质量开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每项“微行动”落到实处，离不开对党员的党性教育和业务能力素质培训。要深化党性修养与宗旨意识教育，通过红色课堂、宣讲活动强化党员身份认同与奉献精神，筑牢思想根基，激发参与“微行动”的内在自觉。同时，要重视实践养成，围绕政策解读和矛盾调解技巧开展针对性强的技能培训，提升党员解决“微问题”的专业能力，使专业能力和素养提升成为党员“微行动”汇聚基层治理“大合力”的重要支撑。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首提全球治理倡议，意义何在

□ 吴国鼎 张尊月

9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在天津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题为“凝聚上合力量 完善全球治理”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该倡议聚焦国际秩序改革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原则和路径。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是现代全球治理的起点，旨在通过集体行动解决全球性问题，开启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新实践。在这一历史和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恰逢其时。

发展中国家崛起，国际格局发生变动。当前，世界格局正发生历史性变化，显著特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20世纪末的不足20%升至约40%。这一格局变化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变化，也是技术革新、产业链重构等的综合体。然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不足，未能充分体现其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国际规则的制定仍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未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和诉求。这都导致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实现真正的包容与公正。

单边行动加剧，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当前，多边主义作为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单边行动。政治极化、议题安全化、国际制度武器化、金融工具政治化等是其突出特征。美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其政策反复与战略收缩对多

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美国等国家的行为导致全球治理更具对抗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全球治理遭遇阻遏。

传统领域问题持续，新兴领域问题涌现。传统治理领域问题持续发酵，国际形势愈发复杂多变，地区冲突频发且长期化，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威胁地区稳定及全球安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采取关税壁垒等措施，阻碍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导致和平时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下，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太空、海洋、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发展迅速，成为全球治理的焦点。这些新兴领域普遍面临着监管与规则缺失的问题。国际社会亟待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新兴领域特点的治理规则与机制。此外，现有国际制度之间的制度重叠与规则冲突问题突出，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构建的高标准和排他性制度进一步加剧了制度复杂性，这都对全球治理的协同性与有效性构成严峻挑战。

并非要替代现行治理体系

从联合国成立到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治理体系需与时俱进。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并非要替代现行治理体系，而是对现行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中国的这一行动既是应对当下全球治理危机的务实之举，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布局，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

丰富全球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框架。主权平等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解决了由谁治理的问题；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保障，明确了依据何种准则进行治理的问题；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回答了该如何治理的问题；以人为本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确立了为谁治理的问题；行动导向是全球治理的关

键，解决了如何体现治理成效的问题。全球治理倡议既明确了原则和方向，又强调了实践和落实，实现了全球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

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与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分别从治理、发展、安全、文明四个关键维度构成了一个内在关联、相辅相成有机整体，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这一理论体系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体现和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倡议将“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思想融入当代全球治理理论，形成了兼具历史传统底蕴与时代特征的治理理念。

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全球治理倡议，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和建设性，为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和形成合力，共同加强全球治理提供了指引和动力。面对“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倡议所倡导的核心理念，反映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诉求，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待。倡议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的国家提供了对话与合作的理论基础。

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

全球治理倡议愿景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中国的倡导，更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在共同行动中逐步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从愿景转化为现实，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强全球治理需要国际社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需要坚守联合国主导的国际法治，切实履行全球治理义务。国家之间要加强协调，促进大国关系良性互动。国家之间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要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公平竞争。要完善全球新疆域治理，秉持和平、发展、普惠、共治原则，积极推动新疆域治理规则与时俱进。

携手全球南方，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体制需要进行改革以反映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变化。首先，应提升发展中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可以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完善多边决策程序的民主协商机制，构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国际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新架构。其次，加强新兴制度平台建设，向国际社会传播全球南方的声音。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对话与沟通的重要平台。发展中国家应持续借助这些平台，凝聚共识，催生一系列新制度，从而更有效地表达自身诉求。

破解治理赤字，保障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国际公共产品是进行全球治理的手段和载体。为加强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一方面，要在巩固既有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公共性和区域性治理路径以完善治理网络。另一方面，应加快新兴问题领域机制建设，强化国家间沟通与制度间协调。首先，加强新兴领域内部的制度协调，制定统一标准与规范，兼顾各国不同发展水平与需求。其次，强化不同领域间的制度协调，实现协同推进。此外，应重视并引导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其专业与资源优势，使其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全球治理复合体。

总之，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既回应了国际社会对解决当前全球面临问题以及建立公正合理治理体系的迫切要求，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这一倡议并非要否定和推倒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而是力求通过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具包容性、公正性与有效性。要实现这一愿景，国际社会需要团结协作，携手前行，从而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